

# Mao Tse-Tung and the Middle Peasants, 1925-1928

Philip C. C. Hu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SA*

*huang@history.ucla.edu*

No ORCID

Liuyang Zhao Trans.

*zhaoliuyang123@126.com*

No ORCID

## 毛泽东与中农（1925-1928）<sup>①</sup>

黄宗智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

赵刘洋 译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ceived 27 April 2025 | Accepted 15 May 2025*

**摘要：**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主要意义在于肯定了农村中的群众运动，这一立场和统一战线的领导层明显不同。在强调农村的作用方面，他与当时陈独秀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所持有的城市导向同样不同。之后的几年中，毛泽东在寻求农村社会革命战略时面临的核心问题，即是革命者如何同时激发贫困农民的积极性和争取中农的支持，而号召中农的方式最终成为他如何看待群众运动的基础。从长远来看，随着毛泽东的崛起，农民群众运动将成为革命的主旋律，而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也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方法和认识论。

**关键词：**毛泽东；中农；群众运动；实践

1947年12月25日，在非常重要的土地改革运动期间，毛泽东指示所有干部要遵循“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毛泽东，1972：第10卷，105）。这种依靠贫农和雇农、同时联合中农的策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的基础。本文从1927年之前毛泽东起初思考和组织农民的背景出发，来考察这一战略的早期起源。

## 统一战线下的“农民问题”

---

<sup>①</sup> 本文译自 Philip C. C. Huang. “Mao Tse-Tung and the Middle Peasants, 1925-1928.” *Modern China*, Vol. 1, No.3, 1975, pp. 271-296. 此文乃黄宗智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文章，特译为中文，以飨读者。此文翻译获得译者主持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百年海外学者视野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研究”(项目编号:2021EKS001)的相应支持。

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是由相互冲突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组成的统一体。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被掩盖，部分原因是这一联盟最初仅由知识分子聚集而成，他们共享诸多相同的论调；个人和派别之间的不同倾向只有在言语转化为行动和权力后，才变得不可协调。在这些冲突浮出水面打破统一战线之前，表面上的团结是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所共有的弱势，以及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

国共两党的一个基本分歧在于对群众运动的态度。蒋介石和陈独秀形成鲜明对比：蒋介石最终依靠军队并将其作为所有权力的来源，而陈独秀则专注于城市劳工运动。

而在那些强调群众运动的人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微妙的差异变得更清晰：无论汪精卫和大多数国民党左派说了什么，他们最终都将群众运动视为一种可以随意操纵的工具，并在社会革命和群众实际行使权力的幽灵前退缩。1928年之后，他们会与国民党右派势力联合起来镇压群众运动（Dirlik, 1975）。共产党人至少在理论上将群众行动视为积极有益的事物，并且将群众组织视为正当与合法的权力来源。

然而，即使对于共产党人而言，理论上对群众行动和群众力量的信仰也并非总是与现实行动一致。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在书斋中研习理论的经验要胜于革命行动，许多人尚未面对过实际参与群众组织和群众斗争的考验。

共产党人在城市和农村的相对重要性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他们大多数属于城市知识分子，自然更关注城市而不是农村。对许多人而言，只有来自城市无产阶级的群众力量才是可靠的，而不是农民。惟有少数人才会把注意力转向农村组织。

因此，农民问题——如何对待或帮助农民——一开始就成为统一战线领导层中的一个低优先级问题。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是敷衍了事地关注这一问题：其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于2月成立，仅负责进行调查、出版刊物、建立农民夜校等任务（罗绮园，1926a）。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与统一战线所宣称的立场没有显著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和宣言中有大量关于农民的言论：例如，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称：“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中的最大要素。”但是，该宣言并没有呼吁组织农民，而是宣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编，1970：第1卷，140；142）。1923年5月3日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指示似乎更清楚：“农民问题是一切政策的中心问题。”但仍缺乏关于农民组织的具体指示（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编，1970：第1卷，256）。第三次党代会对此也同样含糊不清：

“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编，1970：第1卷，256）。然而行动记录则是明确的：1925年1月，党员总数只有950人，几乎全是知识分子（Harrison, 1972: 61; 64）；作为党刊的《向导》周报——每期刊载4到10篇文章——直到1926年底才刊登约4篇关于农民的文章；党本身似乎直到1926年3月才成立农民部（Snow, 1938: 161; J. Chen: 1965: 381）。

尽管大多数高层领导人最初倾向于不支持农村组织，但在统一战线最后两年半的时间里，农村组织仍然获得巨大的发展。这很大程度上是一小撮人主动行动的结果，是农村部分地区对他们的努力做出回应的结果，也是农民运动恰好对革命力量扩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结果。

1921年，在浙江省萧山县衙前村出现了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农民协会（《新青年》，1921）。不久，在江西的两地、湖南的衡山、青岛附近以及广东东部的海丰、陆丰两县，也相继出现了类似的工作和动向（邓中夏，1923）。

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地区的组织工作被证明是最为重要的。彭湃的组织工作是在军阀陈炯明的势力范围内进行的，而陈炯明则是广州革命政府联合战线的直接敌人，到1923年1月，彭湃的农民协会已经拥有两万名成员（Etō, 1961: 171）。彭湃的农民协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对统一战线与陈炯明及支持他的强大的地主利益集团作斗争可能大有裨益。

彭湃的影响以及在他的领导下的运动的力量，无疑促使广州领导层在农村组织工作中采取越来越激进的立场。1924年6月，革命政府发布了《第一次农民运动宣言》，号召建立农民协会和组织农民自卫军（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编，1970：第1卷，407-408）。一个月后，广州领导层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农民组织培训干部，并任命彭湃为第一届的负责人（罗绮园，1926a）。

彭湃所领导的农民运动确实被证明有助于扩大广东政府的权力。1925年2月第一次东征陈炯明时，农民协会为革命军提供了重要的后勤和情报支持，甚至蒋介石也承认这一事实。同样的情况发生在10月的第二次东征中；这一次，广州的领导层成功地巩固了其在广东省的权力（Etō, 1962: 149-155; Schram, 1967: 91）。

同时，两次东征极大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革命军队使地方权力天平向群众运动一边倾斜。到1925年5月，彭湃所领导的协会已经拥有626457名成员（罗绮园，1926b: 654）。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承认农民运动的权力和内容。与第一次大会不同，第二次大会对农民运动给予更多关注，呼吁打击“劣绅”和“贪官”，并主张武装农民（《中国农民》第6/7期，1926年7月：695-699）。

大会还向农民部分配了每月 18000 元的预算，这要高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他任何部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1953：8）。当时似乎无人能预见到湖南会出现不同的情况。与广东不同，湖南的农民运动将与国民党吸收的一些军官和地方军阀的既得土地利益直接发生冲突。1926 年初，国民党二大的期望是农民运动将为即将到来的北伐做出贡献，就像它在广东的东征中所做的那样。

因此，在 1925 和 1926 年，少数热衷于农民组织的成员能够在大多数统一战线领导人的支持下行动。

## 毛泽东与农民部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回忆，他是在 1925 年夏天英国警察在上海屠杀学生和工人引发抗议运动之后，才在湖南首次参与农民组织。他和其他人在几个月内成功组建了“二十多个农会”。但后来他不得不逃往广州，并在那里度过了从 1925 年末到 1926 年末的大部分时间（Snow, 1938: 160; Schram, 1967: 81-83）。

正是在广州和国民党的农民部，毛泽东开始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农民运动上。正是在这里，他写下关于农民的第一篇文章《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这篇文章于 1926 年 1 月在该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第 1 期上发表。他很可能作为教师参加了 1925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8 日举办的第五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到 1926 年 3 月，他已成为农民部核心成员之一，加入该部门掌权的农民运动委员会（《中国农民》第 4 期，1926 年 4 月：441—447）。他很快赢得该部门其他积极分子的尊重和信任，并被任命为第六届讲习所的负责人。

毛泽东所在部门的多数同事是共产党员。蒋介石后来哀叹，共产党主导了该部门（Etō, 1961: 179）。从 1924 年 2 月至 1926 年 1 月，该部门名义上的领导人发生六次变化，但有四人确保了连续性和共产党的影响：彭湃担任第一任书记，直到 1924 年 11 月被罗绮园所替代。彭湃继续作为三名组织秘书之一；另外两人是阮啸仙和谭植棠。彭、罗、阮是广东农民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组成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会（从 1925 年 12 月起），这是广东省农民运动的中央协调机构。上述四人与毛泽东，领导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连续六届的会议——彭湃是第一届，毛泽东是最后一届，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届，从 1926 年 5 月 3 日至 10 月 5 日（罗绮园，1926a；《中国农民》第 6/7 期，1926 年 7 月：695-699；1926 年 4 月：448-449；罗绮园，1926b；Klein and Clark, 1971: 721）。不同于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其他部门，在这一部门，农民工作，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行动上都是至高无上的。

彭湃、阮啸仙、罗绮园、谭植棠和毛泽东五人的著作，构成了当时农民具体行动和农民组织实际经验的大部分。罗、彭和阮详细讲述了他们在广东农民组织中的经历和遭遇（罗绮园，1926b；彭湃，1926；阮啸仙，1926）。毛泽东则详细

讲述了江浙地区农民对地主和官员虐待所进行的零星和自发的抵抗，并详细描述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毛泽东，1926d；1926e）。对他们来说，农村组织工作不仅仅是农民问题的某种口号或理论练习，而是革命行动的直接焦点。

和统一战线的大部分领导人一样，毛泽东和农民部其他积极分子最初都是城市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农村很落后，农民很原始。但是他们亲身接触了农村的革命浪潮，这种接触使他们对农民群众充满信心。正是在这一方面，农民部的积极分子与统一战线的其他大多数领导层相比，显得与众不同。

## 毛泽东 VS 陈独秀

农民部的积极分子不仅在统一战线的领导层中是少数，而且在共产党中也是少数。

中共关于农民问题的主流立场，最能体现在总书记陈独秀身上。陈独秀于1923年7月1日在《前锋》第1期上首次以《中国农民问题》为题发表文章。他对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区分大、中、小地主、自耕农兼地主和自耕农兼雇主、自耕农兼佃农、佃农和雇工，这与毛泽东后来在1926年所做的分类大致相同。陈独秀急切地将佃农以及佃农兼雇主等同于“半无产阶级”，将雇工等同于“无产阶级”，因此，即使在一个以组织无产阶级为最高优先事项的计中，也必须包括农村。但陈独秀没有继续得出这个结论。事实上，他尖锐地断言，中国农村的趋势是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农村地区的剥削程度不像资本主义国家或地主更强大的国家那样严重（陈的例子是沙皇俄国和印度），农村中不同阶级的生活水平差异也不大。同时，陈独秀在党报《向导》周报上，曾回应一位建议在农村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读者：

*先生所主张的乡村共产主义运动，鄙见以为未免浪漫一点，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须以工厂工人为主力军，小农的中国，自耕农居半数以上，这种小资产阶级，他们私有权的观念异常坚固，如何能做共产主义的运动？共产主义的运动如何能在自耕农居多的中国乡村成功群众的运动？（《向导》第34期，1923年8月1日）。*

随后，陈独秀多次呼吁组织农民（《向导》第48期，1923年12月12日），甚至武装起义（《向导》第53/4期，1924年2月20日），宣布劣绅、军阀和官僚是当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革命对象，并重申“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向导》第70期，1924年6月18日）。然而，到1926年6月16日，当农民运动在广东已经声势浩大，并在湖南迅速蔓延时，陈独秀却对农民作为革命力量表示了深刻的怀疑：

*任何民族中封建社会时代的农民，他们的思想都不免有顽固迷信的色彩，他们的行动往往偏于破坏而不免于野蛮，这本是落后的农民原始暴动之本色。（《向*

导》第 158 期，1926 年 6 月 16 日）

毛泽东在 1926 年初关于农村的观点框架与陈独秀两年多前发表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没有太大不同。与陈独秀一样，毛泽东对农村的阶级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而且，与陈独秀及当时其他人一样，毛泽东将农村人口分为地主、自耕农、半佃农、佃农、雇工和手工业者等主要类别。在这一分析中，主要剩余榨取模式被理解为地租。但与陈独秀不同的是，毫无疑问，由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甚少，他接着将“大地主”等同于“大资产阶级”，将“小地主”等同于“资产阶级”，将自耕农等同于“小资产阶级”，这种等同理解肯定让陈独秀大吃一惊。

然而，主要区别是在其他方面。陈独秀把农民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最后却将整个农村皆视为小资产阶级，与陈不同，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这些不同类别的农民分别与革命有什么关系？谁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成为革命的朋友？简而言之，这种分析对革命行动有什么影响？毛泽东的回答得出了陈独秀不愿得出的结论：农村无产阶级—雇农—革命主力军，农村半无产阶级—佃农—主要盟友，而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可以团结起来参与革命事业。换句话说，农村具有自身的革命动力，而不是陈独秀所描绘的小资产阶级主导的场景。（毛泽东，1926a；1926b）

这种将农村视为小资产阶级与将其视为革命动力的差异，源于二人对农民的不同态度。陈独秀在分析中尽力保持平衡，既指出阶级矛盾，同时又断言无法清晰划分阶级界限，正如前文所述，他的结论是农民容易带有“反动思想和迷信”，倾向于“破坏和不可避免的野蛮行为”。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论述则更加肯定和有力，并以“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团结起来！”作为结语（毛泽东，1926b：173）。

虽然毛泽东还没有公开与陈独秀决裂（他后来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做了），但他文章中的语气足以让陈独秀反感，以至于陈独秀拒绝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毛泽东的文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1953：265；Snow，1938：161）。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使毛泽东与陈独秀（以及统一战线领导层中的其他人）之间的分歧公开化。这场运动在 1925 年夏天还只是星星之火，但在 1926 年却成为燎原烈火。1925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8 日举行的第五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为 41 名湖南人提供了组织领导和指导。到 1926 年 6 月，全省共有 43 个乡级农民协会，据称已有 38150 名会员。随之而来的巨大动力来自于北伐战争和革命军 7 月横扫湖南，正如广东的模式一样。据报道，到 1926 年 11 月，农会成员已经增至 130 万人，1927 年 1 月达到 200 万人，1927 年 6 月达到 4517140 人（毛泽东，1927b：208，222-225；《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1953：18；262）。从 1926

年 10 月开始，运动在一些地区变得强大到足以挑战当权者。反革命镇压随之而来，在 10 月之后的几个月里，斗争变得越来越暴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1953：281-287；318；332-336）。

在这场愈演愈烈的斗争中，毛泽东在结束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负责人工作后不久，重新加入湖南农民运动。12 月，他参加了第一次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并主要负责起草了大会的《宣言》。毛泽东以“我们农民”的名义发言，呼吁无条件支持湖南的农民运动。他首次使用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表述；1926 年 12 月的引用并不是指国际关系，而是指军阀-地主势力与农民势力之间的斗争（毛泽东，1927a：205）。

1927 年 1 月 4 日至 2 月 5 日，毛泽东在湖南进行了著名的农民运动考察。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强烈地表达了他的观点。这场运动的巨大势头证实了他对农民革命力量的希望——过去只是暂时的信仰，现在则是革命信念。正如他所说的：“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毛泽东，1927b：212；毛泽东，1965：第 1 卷，27）。显然他自己也觉得这段经历非常振奋人心：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毛泽东，1927b：208；毛泽东，1965：第 1 卷，24）。

他的《报告》针对的是所有反对农民运动的人，特别是那些在反对农民运动的同时却坚称自己支持更温和的群众运动的人。毛泽东特别针对那些批评农民运动暴力及其“过分”行为的人，以及那些指责新崛起的农民只是吵闹和无知暴徒的人。对毛泽东来说，问题的核心是对农民群众力量的态度：是觉得它可怕，还是觉得它振奋人心。他认为，农民革命暴力相比于比其巨大得多的反革命暴力更具正当性，这种暴力实际上是推翻旧秩序的必要阶段；正如他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对毛泽东来说，农村革命风暴的现实没有留下骑墙的余地。要么反对，要么支持。在暴力斗争的背景下，声称自己虽然认同其目标，只憎恶其过激行为，等于是站在反革命的特权阶级一边。那种声称自己寻求唤醒和动员群众，只是害怕群众运动和行动的现实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说是反革命的，正如他所说的：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

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毛泽东，1927b：208；译自毛泽东，1965：第1卷，24）

他本人则对广大农民运动表达了无限的信心和信任：如果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城市工人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毛泽东，1927b：211-212）。

此立场明显违背统一战线大多数领导层的意识形态。《报告》认为，农村不仅是“革命者”谈论和思考的“麻烦”或“问题”，而且是革命能量的源泉。对毛泽东来说，共产党人在行动和言辞上皆必须投身于这场运动。

无论是在重点还是在提出的问题上，《报告》都预见到后来的态势。几周后，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屠杀共产党和其他进步人士，打破了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脆弱的联盟：然后是在湖南与国民党军阀的决裂，先是何键和许克祥，最后是唐生智和国民党左派。湖南的农民运动实际上造成了一种没有居中立场的局面。关系破裂后，共产党被赶出城市中心，进入农村，这更多是由于实际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选择。

但就在与国民党左派最终决裂的几周前，4月27日至5月6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拒绝了毛泽东的《报告》。正如研究这次大会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该会议在许多理论上吹毛求疵（Schram, 1967：107-110），但真正问题已经足够清楚：湖南农民运动所产生的动力，直接威胁到强大的湖南国民党军队的利益，其军官主要来自湖南地主。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应该顺应湖南农民革命的浪潮，还是为了维护统一战线而试图对其进行遏制？即使在蒋介石4月政变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然从远处发出命令，要求既要加强群众斗争，又要保持与国民党左派的统一战线（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编，1971：第3卷，8-12）。然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不得不面对现实。由于矛盾的目标，第五次代表大会就农民问题达成了一项含糊其辞的决议：再次承认农民问题在全国革命中的中心地位；原则上同意土地的再分配；宽容农民夺取政权。但具体指示则显示，他们正在寻求与反对农民运动的人达成妥协：只有拥有500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的土地才应被没收，与革命军军官有关系的地主则被明确排除在外（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编，1971：第3卷，37-46；Snow, 1938：162）。在湖南，每户平均拥有14亩土地，拥有100亩以上者只占地主总数的不到20%（严中平编，1955：285），这相当于首先将大部分革命目标排除于攻击范围以外来号召革命。

正如一位同时期的与会者所说：

*当时.....我们确实陷入矛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要向封建势力、土豪劣绅、资产阶级宣战，另一方面，我们寻求与代表地主阶级的国民党合作.....至于农民*

和工人的要求，我们阻止工农采取行动，并希望他们等待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命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1953：382）

尽管共产党试图维持统一战线，但湖南的国民党军事要员，如何键和许克祥，还是领导了“马日（1927年5月21日）屠杀”，这是湖南反革命镇压农民运动的高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1953：291）。

毛泽东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与彭湃和罗绮园一起，反对陈独秀的主张（Klein and Clark, 1971: 722; Snow, 1938: 161-163），但无济于事。事实上，毛泽东本人对会议过程感到非常苦恼，很快他就以身体不适为借口缺席会议（Schram, 1967: 110）。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批评陈独秀真正“害怕……武装农民”，并遭受“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从而“丧失了党的决定性领导”（Snow, 1938: 164-165）的基础。

## 中间阶级

众所周知，《报告》是支持农民群众革命行动的经典宣言；被掩盖的则是它作为关于农民群众运动的动力，特别是农村中间阶级的行性的宣言的意义。

毛泽东不是浪漫主义者。在肯定农村革命、打破陈独秀将农民描述为小资产阶级的图景时，毛泽东并未断言那种与之相反的浪漫主张：即所有农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纯朴善良的，城市文明本质上是腐朽的，回归乡村等同于回归美好。相反，他欣然承认一些农民具有小资产阶级特征，但他坚决认为这些特征并不适用于大多数农民。

这一想法似乎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推导而来的，而是再次源自他在农民组织工作中的经验。早在1926年早期的两篇文章中，他就已经打破农民同质化的观点，指出乡村社会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有着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观点。他对农村阶级的分析，乃是试图对农村社会的复杂性进行系统定义。

他背离于陈独秀的认识，目的在于将农村人口中大多数——自耕农、佃农、农业工人（在他的统计中占农村人口的近60%）作为革命积极力量。他一举将陈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减少到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同时，他欣然承认这个依然庞大的群体所带来的问题。在他看来，拥有并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确实不是可靠的盟友。他们中每年拥有盈余的人（他的数据为1200万）构成右派；勉强自足的人（6000万人）倾向于中立；另一方面，那些遭受赤贫的人（约4800万）则很有可能为革命做出贡献（毛泽东，1926a: 155-156）。但他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争取所有自耕农的支持。

对于毛泽东而言，湖南农民运动证实了这一庞大的摇摆群体的问题。他在《报告》中使用的类别与1926年的文章不同：他现在谈论的是“中农”——一定

义为通常既不欠债务也无盈余的农民，占农村总人口的 20%——和“富农”，而不是早期的中间阶级或自耕农。但他指出的问题是一样的。

毛泽东认为，中农对农民协会往往持保守和怀疑态度：

*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毛泽东，1927b：217-218）。*

毛泽东还未确切地定义他所使用的大量不同的术语——小资产阶级、自耕农、中等收入农民等——的具体所指。事实上，他当时在谈论农村阶级时使用了两个不同的分析框架。在 1926 年的文章中，他主要根据生产关系来构想“阶级”：这一框架将地租作为封建生产关系的核心，农村阶级关系大致被分为三类：通过地租进行剥削的地主、被剥削的佃户以及既不是剥削者也不是被剥削者的自耕农。

《报告》则主要根据收入水平来构想阶级：“中农”是自给自足的人；“富农”是收入高于“中农”的人；“贫农”是低于“中农”的人。正如笔者在其他地方说过的，直到 1933 年，他在《怎样分析阶级》中才提出更精确的定义，更全面地考虑了农村的复杂性（毛泽东，1933；Huang，1975）。

但是，他对摇摆不定的中间阶级的观察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已经非常清楚：从收入平等角度看，富人会受损，而穷人会获益，而相当大的中间阶级基本保持不变。从消除“封建剥削模式”角度而言，作为剥削者的地主会受损，被剥削者会获益，而经济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则不会受到影响。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不可能在政治上处于中间地位。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些期望被他在湖南农民运动中的经历所证实，并在井冈山根据地再次得到证实。

## 井冈山的经验

1927 年 7 月，统一战线的破裂将中国共产党从模棱两可的状态推入混乱。在过去的几年中，共产党采取了一种不可能的战略，试图在群众力量中建立基础而在群众力量的源头——农村，却只是采取半心半意的行动。1927 年夏末，面对反革命镇压浪潮，中国共产党匆忙地试图通过改变对农村革命力量的估计来取得平衡。在 8 月 7 日的紧急会议上，正式解除了陈独秀的党的领导职务（特别是因为他未能正确领导农民运动），制定秋收起义计划，完全依赖农民自发起义。

毛泽东负责协调湖南的起义。秋收起义的混乱局面已经广为人知(Hofheinz, 1967; Hsiao, 1970), 同样广为人知的是, 毛泽东在使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方面与党中央存在分歧。由于他更现实地强调后者, 后来因“军事冒险主义”而受到批判。

10月, 毛泽东率领这场灾难性起义的残余力量, 一支大约千人左右的武装力量, 来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929年1月, 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根据地, 该根据地于1928年6月达到鼎盛, 完全控制三个县, 部分控制另外四个县, 党员达到10000人, 核心军事堡垒则是几乎无法攻克的井冈山。(毛泽东, 1928: 33; 56)

正是在这块根据地, 毛泽东第一次获得关于系统性土地再分配的具体经验。这些经验现在收录在(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毛泽东, 1972)中, 但证据有些矛盾和混乱。

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在这15个月期间, 毛泽东对根据地政策的控制时松时紧。1928年3月至5月以及7月至9月, 他两次被党中央代表从最高领导层中除名。而根据地两次陷入危机, 都是因违背毛泽东的意愿, 命令该地区主力部队向湘南进军。即使毛泽东在1928年3月之前和11月之后明确担任最高职务, 他也很可能不得与其领导下的其他力量和意见妥协(毛泽东, 1928: 28, 57-58; Rue, 1966: 82-117; Schram, 1967: 125-137; Harrison, 1972: 129-147)。在围绕毛泽东的错综复杂的环境中, 很难找出他自己的观点。

然而, 有两份文件脱颖而出, 让我们得以一窥毛泽东在他早期著作中提出的中间群体问题上的不断演变的思想。其中一份是他在1927年8月20日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 此信是在秋收起义前不久写的; 另一份则是毛泽东的《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在目前的《毛泽东集》中被编辑出版为《井冈山的斗争》)。

这两篇文章对农村革命战略的看法大相径庭。1927年8月20日的信中主张“没收一切土地, 包括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毛泽东, 1927c: 12)。然而, 后来的报告多次指出这一政策在中间阶级中造成的困难, 并声明在向新地区扩展的初期, 将采取不没收自耕农土地的政策, 以使自耕农能够支持贫农攻击地主(毛泽东, 1928: 50)。

毛泽东的这两种观点都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党中央。8月20日的信件是在8月7日紧急会议后不久写的, 该会议仅决定没收大地主和中地主的土地, 并迫使小地主降低地租(日本国际问题调查研究所编, 1971: 第3卷, 246; Brandt, 1952: 122)。三个月后, 党中央11月召开的全会推翻了早先决议, 采纳了毛泽东的信中所提出的政策, 没收所有私有土地, 并将土地所有权交给苏维埃政权(日本国际问题调查研究所编, 1971: 第3卷, 382; 404)。在1928年7月的第六次

党代会上，党再次改变了立场，将所有土地的公有化推迟到将来，而将眼前计划仅限于没收地主的土地（日本国际问题调查研究所编，1972：第4卷，54-55）。这当然是毛泽东在11月的报告中所主张的实质内容。但他在倡导这一政策时，可能对第六次党代会的决议一无所知；他只是刚刚得知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8年2月通过的第九次全体会议决议的消息（毛泽东，1928：26），该决议对这一问题只采取模糊的笼统立场（日本国际问题调查研究所编，1971：第3卷，546-533）。

因此，毛泽东改变立场的原因不在于党中央决策的频繁逆转，而在于他自身的经历。正如他在11月的报告中反复敦促党中央的那样，中央今后的指示必须考虑井冈山具体情况，不能敷衍了事地搜集情报，也不能过于僵化，而应该留出依据实际情况做出决策的空间（毛泽东，1928：65）。他对湖南省委早些时候派出的代表提出深刻批评，因为他们态度僵化，形式主义地遵循指示（毛泽东，1928：29-30）。贯穿其报告（实际上贯穿其所有著作）的主题是强调具体的经验和实践，而非僵化的理论，灵活地应对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地服从上面的指示。

毛泽东根据自己在井冈山的经验，详细说明他在农村革命问题上改变想法的原因。他指出，井冈山地区最严重的困难是由中间阶级造成的。没收一切土地并彻底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既打击了中间阶级，也打击了地主阶级。在1928年3月，湘南特别委员会的代表到达井冈山，并将其极端政策强加于根据地之后，这种打击变得尤为严重。红军广泛地向小地主和富农强行征收“捐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革命力量占据上风时，中间阶级仍然试图通过散布谣言和利用他们在村庄中的影响力和家庭关系来破坏革命。当苏维埃政权向前推进时，中间阶级通过隐瞒实际拥有的土地和操纵获得更好的土地来破坏这些努力。他们也极大地影响了贫苦农民，特别是在革命政权似乎不稳固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因为4月之后的根据地不断受到白军的压力；毛泽东，1928：47-48、60）。

当白军于8月重新占领红色地区时，中间阶级立即转向反对革命。他们积极参与逮捕和惩罚革命者。当红军于9月重新占领宁冈县时，中间阶级通过散布共产党会杀害农民的谣言，成功地说服了许多贫苦农民跟随他们逃往附近被白军占领的永新。简而言之，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井冈山的策略将中间阶级推入了反革命的阵营，孤立了贫苦农民（毛泽东，1928：33；48）。

因此，毛泽东和井冈山前委正在考虑对中间阶级作出一些让步。一是在人口和劳动力的基础上增加资本（农具和牲畜），以此作为确定每户获得土地数量的依据——这一政策将使拥有资本的中农和富农比贫农获得更多土地。如前所述，另一项政策是在革命政权更加稳固之前不没收自耕农的土地。

寻求让步以安抚中间阶级，同时主要依靠贫苦农民，这是毛泽东在江西时期与党内其他派别斗争背后的主要策略（然而，这是另一篇拙作的主题）。

## 农村革命的辩证法

在统一战线背景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主要意义在于它肯定了农村中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及致力于农村组织工作的其他人）与统一战线领导层的许多人在群众运动本身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在强调农村方面，他也背离了陈独秀和在陈独秀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导向。在未来几年中，毛泽东对农民群众运动的信念，将继续使他有别于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从长远来看，随着毛泽东的崛起，农民群众运动将成为革命的主旋律。

正是这种对农民群众运动的基本承诺，使毛泽东没有从严格的军事角度来思考革命。1928年的许多经验教训促使人们更加注重革命的军事方面：无论是广东还是湖南的经验都表明，革命军队是农民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井冈山的经验表明，白军的军事力量是释放贫农积极性的障碍，也是中农抵抗的强大支持。毛泽东确实在1928年得出结论，红军不仅是战场上的工具，也是社会革命的工具。但他没有像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中的许多人那样，将革命等同于军事胜利，将社会革命归结为军事胜利之后的事情（Dirlik, 1975），将社会革命视为可以自上而下强加的东西。他对农民群众运动的基本承诺决定了他不同的观点：农民是革命中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任人摆布的被动追随者。《报告》接着指出，作为积极参与者，不同的农民与革命的关系是不同的。

对1928年的毛泽东来说，从农村群众运动中吸取的主要教训是中农的问题。毛泽东对党在湖南农民运动中的表现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党没有充分激发贫农的积极性，因此未能充分释放农村的革命力量。在井冈山，毛泽东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不仅打击地主，还打击富农和中农。然而，他发现这样的政策疏远了除贫农以外的所有人；革命者未能争取到大多数农村人口的支持。

其他人可能认为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无关紧要，但毛泽东却坚持这样做。对他而言，多数人的自愿支持是任何成功的群众运动的核心要求。因此，到1928年，他寻求农村社会革命战略的核心问题已经变成：革命者如何在激发贫农的积极性的同时争取中农的支持？

正如后来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对于党的一些领导层来说，这些属于矛盾的情况，不可能也不需要同时被解决。然而对毛泽东来说，寻找团结中农的方法最终成为他整个群众运动观的基础。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sup>1</sup>一文中系统地阐述这一观点，他指出任何群众运动中都有三个主要群体：积极分

---

<sup>1</sup> 译者注：此文在《毛泽东选集》第3卷中名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在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9卷中名为《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子、摇摆不定的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因此，他强调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使大多数人参与群众运动，只有这样，才能够孤立群众运动所打击的目标（毛泽东，1943：26-27）。

同样的思想亦体现在他关于“非对抗性矛盾”的表述中：“‘对抗性矛盾’，如地主和大多数农民之间的矛盾，确认出革命中的敌人和朋友；而‘非对抗性矛盾’，如贫农和中农之间、领导层和群众之间的冲突，则揭示革命阵营内部潜在的利益冲突。必须认识到并系统地处理这些潜在的利益冲突。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团结，并由此产生积极互动。例如，要求领导在群众中工作和生活的政策。在农村社会革命中，这一策略意味着，依靠贫农作为反对地主的革命积极性的主要来源，同时注意不要攻击中农的利益，而是让他们参与社会革命。必要时，也可以依靠中农来缓和和稳定群众运动。在1928年，该战略还需要几年才能完全制定出来并在实践中检验。但毛泽东已经确定了基本原则——涉及大多数农民参与的群众运动——以及核心问题：不能让摇摆不定的中农对革命抱有敌意。这就是1947年12月25日对土地改革干部的指示背后的考虑。

#### 参考文献：

- Brandt, C., B. Schwartz, and J. K. Fairbank(1952)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 陈独秀(1923) *Chūigoku no nomin mondai*” (China’s peasant question), pp. 266-272 in *Nihon kokusai mondai kenkyūijo Chūigoku bukai* (1971). Vol. I.
- Chen, J. (1965)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 Chiang Kai-Shek (1956) *Jiang zongtung yenlun huiben* (Col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President Chiang). Vol. VIII. Taipei: Zhengzhong shuju.
- 邓中夏(1923): 《论农民运动》，载《中国青年》第11期，12月29日。
- Dirlik, A. (1975) “Mass movements and the Left Kuomintang.” *Modern China* 1, 1(January): 46-75.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1953），北京：人民出版社。
- Etō Shinkichi (1961-1962) “Hai-lu-feng--the first Chinese soviet government.” *China Q.* 8 (October/December): 161-183; 9 (January/March): 149-181.
- Harrison, J. (1972)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New York: Praeger.
- Hofheinz, R. Jr. (1967) “The autumn harvest insurrection.” *China Q.* 32 (October/December): 37-87.
- Hsiao Tso-Liang (1970) *Chinese Communism in 1927: City vs. Countrysid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uang, P. C. (1975) "Analyzing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 Revolutionaries versus Western Scholarship," *Modern China* 1, 2 (April).

Klein, D. W. and A. B. Clark (1971) *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65*.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罗绮园 (1926a)：《本部一年来工作工作报告概要》，载《中国农民》第 2 期（2 月 1 日）：147—207；第 3 期（3 月 1 日）：231—250。

罗绮园 (1926b)：《会务总报告》，《中国农民》第 6/7 期（7 月）：639—687。

毛泽东 (1972)：《毛泽东集》，竹内实编，共 10 卷，东京：株式会社苍苍社。

毛泽东 (1965) .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4 volume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毛泽东 (1943)：《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载《毛泽东集》(1972)，第 9 卷，第 25-31 页。

毛泽东 (1933 年 6 月)：《怎样分析阶级》，载《毛泽东集》(1972)，第 3 卷，第 265-268 页。

毛泽东 (1928 年 11 月 25 日)：《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载《毛泽东集》(1972)，第 2 卷，第 25-66 页。

毛泽东 (1927a)：《湖南的农民》，载《毛泽东集》(1972)，第 1 卷，第 187-200 页（见《向导》，1927 年 1 月 6 日）。

毛泽东 (1927b)：《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集》(1972)，第 1 卷，第 207-249 页。

毛泽东 (1927c)：《湖南致中央函》（1927 年 8 月 20 日），载《毛泽东集》(1972)，第 2 卷，第 11-12 页。

毛泽东 (1926a)：《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载《毛泽东集》(1972)，第 1 卷，第 153-161 页（《中国农民》，1926 年 1 月 1 日，第 23-30 页）

毛泽东 (1926b)：《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61—175，载《毛泽东集》(1972)，第 1 卷（《中国农民》第 2 期，1926 年 2 月 1 日，第 133-145 页）。

毛泽东 (1926c)：《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载《毛泽东集》(1972)，第 1 集，第 175-179 页（《农民运动》，9 月 8 日，第 175-179 页。）

毛泽东 (1926d)：《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载《毛泽东集》(1972)，第 1 卷，第 181-185 页（《向导》第 179 期，1926 年 9 月 21 日）。

毛泽东 (1926e)：《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载《毛泽东集》(1972)，第 1 卷，第 201-206 页。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部编（1970-1974）：《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12卷，东京：劲草书房。

彭湃（1926）：《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国农民》第1期，第59-69页；第3期（3月1日），第251-269页；第4期（4月1日），第351-381页；第5期（5月1日），第489-524页。

阮啸仙（1926）：《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之经过》，《中国农民》第3期（3月1日），270—296。

Rue, J. (1966) *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 1927-1935*.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Schram, S. (1967) *Mao Tse-tung*.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Snow, E. (1938)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向导》周报，第1期至201期（1922年9月13日——1927年7月18日），东京：大安出版社重印版，1963年，5卷。

《新青年》（1921）：《衙前农民协会宣言》，第9卷第4期（8月1日），东京：大安出版社重印版，1962年，第12卷：561—565。

严中平编（1955）：《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nongmin (The Chinese peasants), I to 6/7 (January 1, 1926-July 1926)*. Reprinted Tokyo: Daian (1964).

#### 作者简介

黄宗智终身研究的明清至今农业-农民与“非正规经济”的五卷本专著（其中，《华北》和《长江》两本已经是第六、第七版）、法律与正义体系的四卷本、和关于“实践社会科学”的方法-理论的四卷本，已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汇集为13卷著作集出版。

#### 译者简介

赵刘洋，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关注的领域是法律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他正在撰写一部探讨中国发展道路经验与挑战的著作。